清史学术百年

在美国书写清史*

罗威廉 著
林　展 译

1984 年，柯文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出版，①这在清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该书标题正好反映了自该书出版之前十年左右以来美国的清史研究所发生的巨变，即从主要强调中国——西方的互动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变迁。这一标题甚至很好地反映了美国清史研究从 19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这一长时期内的转变。整个转变过程具有如下特征：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也许最好概括这一转变的是，逐渐倾向于使用更为中性的地区名称“东亚”，而不是用很明显具有西方中心观念的“远东”）；从认为中国社会和文化令人费解、充满异域情调甚至稀奇古怪到对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产生移情，认为他们在生活本质上与美国人是相似的；从基于新教改革、经济或者政治改革的目的工具性地看待清史，或是把其当作一个“停滞”的负面典型来评估以反映西方的“进步”，到认知并理解中国社会自身具有的价值。

发轫

从 1780 年代开始，美国商船开始周期性地停靠广州港。但是美国人对大清帝国和中国总体的认识，仍然建立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中心观上，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比如到了 1939 年，一项针对美国学校“世界历史”教材的调查发现，只有 3% 的内容是关于中国或日本的。到 1942 年，在珍珠港偷袭事件发生之后，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美国人中，60% 的人不能够在简化的世界地图上指出中国的地理位置。直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是高度碎片化、自相矛盾的，甚至一无所知。②

到了 1880 年代，美国与清朝的交往还是很少，对“中国”的普遍认识，既脱离中华帝国的

［收稿日期］2015 -01 -20
［作者简介］罗威廉（wiliam T. Rowe），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展（1984 -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linzhan126@126. com

*　感谢马钊和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对本文早期版本的评论。读者会注意到，本文的目的是讨论反映美国清史研究趋势的著作，而不是考察清史研究领域哪些著作是我认为“最好”的，实际上，后者中的很多著作，这里并没有提到。

①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和印度形象》（Harold R.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John Day, 1958, 37 and 48）。

现实，也看不出普通美国人有了解的意愿。这些认识，更倾向于反映“美国社会对自己身份的追寻”。① 19 世纪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中国比欧洲古老，比美国则更要古老得多。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停滞不前”，即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技术一直停留在原始水平，商业被抑制。相对于美国的“自由”，中国的政治系统是“专制的”，意味着臣民必须服从于独裁者的独断专行。作为充满朝气、无比自由和先进的美国人，帮助中国人“启蒙”和“赋予他们现代文明的恩惠”，是自己的道德使命。② 非常受欢迎的《中国总论》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认识，它的作者是卫三畏。该书在 1848 年初版，随后在 1857、1883 和 1901 分别再版，是 19 世纪中期和后期的美国人理解大清帝国的基准。③ 卫三畏（1812—1884）出生在纽约州尤蒂卡一个笃信新教的家庭，在伦斯勒理工学院受到训练成为一名科学家。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卫三畏对中国的研究，和他对自然史的研究一样，是受着揭示上帝在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一目标所引导。1833 年，卫三畏作为一个传教士来到中国，自此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巨大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与敌对的超自然力量（上帝和撒旦）随时发生碰撞。”④ 但是，卫三畏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很快转向他的第二项使命。他发现在他的同胞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中国人是异类，拯救他们毫无作用。这一观念在他所处时代的福音派文学作品中尤其普遍存在。在《中国总论》以及他主编了数十年的传教士杂志《中国丛报》中，他坚持认为中国人是有尊严的，认为他们与西方人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也是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他在《中国总论》中声称他的目标是“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经常地加予他们的那些奇怪和几乎无可名状的可笑印象。”⑤ 卫三畏非常精通汉语，尊重中国文化、知识和政治传统。他渴望传教，认为在宗教信仰上的堕落并非为中国人独有，“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道德，即可发现他们与其他人群在本性堕落这一特征上的相似性。正如其他人一样，美德之光明与邪恶之黑暗交织在他们的性格当中。”⑥

尽管他在 19 世纪中期就到访中国，以及他所取得的历史学成就与后来成为清史学家的那些美国人差不多，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不如说是按照启蒙科学分类法整理有关中国事务的一种百科全书。“清朝”在他所关注的子主题中并不重要。卫三畏注意到，“现在的王朝”自称为“大清国”，她的人民拒绝使用相应的自我称呼“清人”，他们对国家最常用的称呼是“中国”。⑦ 在《中国总论》一书的标题和内容中，卫三畏避免使用“清朝”，而是一直使用“中华帝国”。

不过，在他厚达 1200 页著作的历史考察部分中，卫三畏安排五页的篇幅对清史做了简要介绍。这一部分往往是贬抑的——他取的标题是“满族征服中国”，他认为清朝的建立者努尔哈赤是一个“凶狠的游牧者”，他在占领中国之前，在辽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暴行”，尽管有时候也能宽宏大量。卫三畏注意到清朝极大地扩大了疆域的边界，超过了清朝之前各个朝代的版图。他对康熙皇帝的印象总体是积极的，需要注意的是，同时期的其他“忠于天主教的传教士”均

---

① 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美国和东亚的历史内幕》（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1967, 32）。

② 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美国和东亚的历史内幕》（Iriye, 5 – 7, 17）。

③ 卫三畏：《中国总论》（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Religion*,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2 volumes, New York：Wiley and Putnam, 1848）。

④ 哈达德：《中国的罗曼史》（John Rogers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Excursions to China in U. S. Culture*, 1776 *to* 1876,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在线版本，第 6 章）。

⑤ 卫三畏：《中国总论》（Williams, xiv）。

⑥ 卫三畏：《中国总论》（Williams, 2. 95, cited in Haddad）。

⑦ 卫三畏：《中国总论》（Williams, 1. 3—4）。

倾向于给予康熙“甚高的赞誉”。卫三畏认为当时的执政者道光皇帝，是一个“正派”和“有想法”的人，但存在明显的局限——即他适合做承平年代的皇帝，却难以应对异常紧急的情形，比如当时清朝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威胁。① 卫三畏很慷慨地总结清朝的成就：“毫无疑问，在管理规模庞大的中国人方面，清朝比明朝做得更好，政府管理更加有效，更少地热衷于大兴土木，官员任命更为透明、清廉，人们人身更加安全，地方政府、强盗或法治对产权的侵犯更少——总而言之，满洲人的统治使得中国的产业和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发展。”② 中国人最终所缺少的是，没有意识到“其他权力”（比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也可以用来“惩恶”，从而改善人们的道德和行为。③

在清朝存续最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两件重要新事物影响了他们对清朝及其历史的解释。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是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原理在“种族”和“国家”层面的误用。对1880年代的许多美国人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他们基本的世界观，正如19、20世纪之交时期东亚人对自己的认识。这种新的“科学”，一方面为进步和年轻的美国对停滞和衰老的中国拥有傲慢的优越感提供了新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中国这一古老帝国如果“觉醒”将带来巨大威胁这一设想的担心，“黄祸”成为美国人心里一个巨大的阴影。④

这一时期第二个新的因素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同美国与中国之间有“特别关系”，这一观念建立在“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一更普遍信念的基础之上。“特别关系”论调的出现起因于19世纪末在清帝国生活的美国人不断增长的事实，随后在门户开放政策中进一步得以体现。美国高调地“退还”了庚子赔款。“特别关系”最后演进为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认为美国根本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是唯一对中国友好和仁慈的西方国家，从而也应得到中国的感激。对“黄祸”的不安情绪和与中国保持特殊关系的想法并存，后者在一系列不利因素下存活了下来（可以肯定，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坚信这一点），这些不利因素包括《排华法案》所造成的麻烦，美国西部和夏威夷对中国移民的攻击，美国传教士在晚清遇到的挫折，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对美货的抵制，也许最具破坏性的是美国对菲律宾的吞并。关于“特别关系”神话般的信念逐步演变成美国“大众和官方论调共同的主题”，这一信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影响了一直到1950、60年代费正清时期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也包括费正清）的研究的想法。⑤

在清朝末期对美国人认识清朝影响最大的历史学者是马士（1855—1934）。尽管马士出生在加拿大（新斯科舍），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大清海关官僚体系中，一直升至税务司），直到退休返回英格兰乡下，他是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家庭的后代，在美国读完中学和大学（哈佛大学），主要——尽管不是完全——被看作是一个美国人。他里程碑式的作品包括：《中朝制度史》（1908），《中国之行会》（190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卷，1910—1918）、《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编年史》（5卷，1926—1929），这些作品成为他所在时代的美国人了解清朝历史的基准，正如在他之前卫三畏的工作所起的作用一样。与卫三畏一样，宗教信念对马士而言也同样重要，他的名字来自新汉普顿的一个牧师和神学家何希尔·巴卢（Hosea Ballou，1771—1852），但他是一个上帝一位论者，与卫三畏的长老会相比，他与福音传道者保持距离，离普世教会主义者更近。上帝一位论教派强调社会进步（曾经主张完全的废奴）以及

---

① 卫三畏：《中国总论》（Williams，1. 310）。

② 卫三畏：《中国总论》（Williams，2. 228）。

③ 卫三畏：《中国总论》（Williams，1. 297）。

④ 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美国和东亚的历史内幕》（Iriye，59—60）。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社会生根的经典分析参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G. Braziller, 1965）。

⑤ 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299）。

能轻松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士对清朝历史的研究更多出于对商业而不是对传教的关心。但是，尽管马士说汉语，写汉文，但他“似乎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中国人建立起一种熟络的关系”，也从未质疑过他对“西方文明的道德优越性”的信念。①

马士从来没有明确地将“清朝”（相对于中国）作为他历史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他所编纂的从 1516 到 1860 几百年间重大事件的年表中，1644 年根本没有出现。② 正如他所处时代的普遍认识，马士谴责满洲人是“粗鲁、没有教化的部落战士，他们被赋予管理一个富裕和开化民族政府的责任，但这一工作他们难以胜任”。他完全不重视王权对大众普通生活的影响。他将清帝国描述为强加于中国良性运转的村庄和行会民主之上的“独裁政府”，这一论断非常著名。③实际上，费正清认为自己是马士的“门徒”，理解他导师的“核心主题”，即“清朝权力长期以来的衰落以及无力自救”,④ 马士在《中朝制度史》的开篇简述了清朝每个皇帝的概况，与费正清所描述的清朝的失败如出一辙。我们有“伟大的康熙”，接下来是“全能”的乾隆，但是“进入嘉庆朝，清帝国即开始衰落和退化，法庭变得腐败，行政机构不再有效率，官僚体系中的腐败不再被追查，普通人的公正和安全得不到保证，秘密社会从休眠状况中复苏，不满从帝国的各个地方显示出来。”尽管道光皇帝，“不懈”努力，希望扭转这一进程，但是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到马士自己成为清朝官员系统中的一员时，这一切都无以挽回了。⑤ 可以这样说，正是马士牢牢奠定了英语世界学术关于清史失败的叙事。

中华民国时期的美国清史研究

从 1912 年清朝结束到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越来越多，但关于“清朝”本身的著作却很少，而关于清史的学术著作就更少。大部分美国人通过通史中呈现的相关内容来了解“清朝”，通史是对中国整个长期历史进行概括的、半通俗的历史读物。这个时期的清史研究主要包括四本学术专著，它们各自都与美国一个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相联系，这些专著显示出这一时期美国清史研究的特点。

赖德烈（1884—1968）是在世界各地传教的浸礼会牧师和历史学家，特别关注中国。他毕业于耶鲁大学，1910—1912 年间在长沙的“雅礼协会”项目（Yale-in-China program）中教授英语，但好像没有学习汉语。返回纽黑文之后，他于 1921—1953 年在耶鲁神学院教授中国历史和其他科目。在他 1917 年的著作《中国的发展》一书中，有一章叙述从汉朝到鸦片战争这一时期的历史，该章只在最后几页提到了清朝。也就是说，该书将清朝通商口岸开埠之前与之后的历史割裂开来叙述。这主要只是因为他是一位热衷于传播基督教的历史学家，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视尊崇为现世的一种标志。但是，赖德烈的描述包含了之后很多美国研究清史的历史学者所认可的特征，比如清朝在巅峰时期的“繁荣”与“强盛”得到肯定，以及它实现了疆域的大扩张，并意

---

① 费正清、玛莎·亨德森·柯立芝、司马富：《马士：中国海关税务司和历史学家》（John King Fairbank, Martha Henderson Coolidge, and Richard J. Smith,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223 and *passim*）。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1910 – 1918（reprinted Taibei: Ch'eng – wen, 1978, 1. xxxi）。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1 – 2），也参见马士：《中国之行会》（Morse, *The Gilds of China*,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9, 27）。

④ 费正清：《历史学家马士》（Fairbank, “Morse as Historian,”），费正清等主编：《马士：中国海关税务司和历史学家》（*H. B. Morse*, 224）。

⑤ 马士：《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revised edition, 1913, 12—31）。

识到清朝的衰败早在与西方的第一次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①

与赖德烈同时期但更年轻的傅路德（1894—1986）也是由于美国传教活动来到中国，但是他的兴趣完全不同。他出生在北京郊区，在儿童时代经历了义和团围攻外国公使馆的事件。赖德烈对中国文言文和文学传统知之甚少，而傅路德对这些认识很深。自 1934 年开始直到去世，他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和荣休教员，他出版了美国最早的关于清史的专著，即很有论证性的《乾隆朝文字狱》(1935)。在 1943 年出版的《中国人简史》中，清朝作为该书独立的一章出现，而且内容充实。②

傅路德的著作有很多出众之处。首先，在早期美国人书写清史时，所潜在的那种传教口吻，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完全不见。其次是他推动了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当作“我们自己的陪衬”③ 这一研究倾向。中国人虽然与西方人不同，但是，不像日本人和印度人，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相当多的相似性，这使得中国人成为一个可以更好衬脱出西方人的优越性的参照物。他们主要的相似性在于他们的“伟大的历史传统”和他们在技术创新上所创造的记录。傅路德曾出版了一位已故同事，关于“印刷术在中国的发明”,④ 他很明显地倾向于从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成就来评估中国的历史，对清朝历史的描述着重强调清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

20 世纪中期美国汉学家中观点最独特的一位是拉铁摩尔（1900—1989），他于 1937 至 1963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拉铁摩尔对政治事件和名人没有兴趣，所以对朝代史不关心，在他的中国通史中，只花了三页半的极少篇幅介绍“满洲王朝”，他真正的兴趣在于研究生态环境对历史进程、一些宏伟构思的历史“类型”或历史“模式”以及对跨文化历史比较的影响。拉铁摩尔直言不讳地批判西方优越或中国优越这一种族中心的历史叙述，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并不认为清朝与明朝有根本性的差别，而是认为满洲王朝是“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征服王朝”⑤。但作为亚洲内陆历史和边疆比较历史研究的先行者，他对半个世纪之后的“新清史”有深远的影响。总而言之，拉铁摩尔对美国清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正面：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有时作为具有左派倾向的外交官（当然他绝不是一个教条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被认为在美国“失去中国”过程中存在串谋，他被迫害并最终被驱逐出美国学术圈，在这个过程中，他研究比较全球史的大胆风格在至少一代的美国的汉学家中不被重视。⑥

这一时期在美国出版的第四部关于中国通史的历史书做出了最具野心的论断，其把西方历史分期强加于清帝国。这本书就是历史社会学家艾伯华（1909—1989）出版的引人注目的《中国通史》，最初是用土耳其语出版，1950 年英文第一版。⑦ 艾伯华出生在德国，由于纳粹的兴起，他离开了德国，在土耳其生活了 11 年，最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从 1948

---

① 赖德烈：《中国的发展》(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7, 66—85)。

② 傅路德：《中国人简史》(L. 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third edition, 1959 (第一版 1943)。

③ 傅路德：《中国人简史》第一版序言（Goodrich,“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ix)。

④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⑤ 欧文·拉铁摩尔和埃莉诺·拉铁摩尔：《中国简史》(Owen and Eleanor Lattimore, *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47 (first edition 1944), 106—109)；也参见罗威廉：《拉铁摩尔，亚洲和比较历史》，《亚洲研究杂志》(William T. Rowe,“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 3 (August 2007))。

⑥ 比如，参见罗伯特·纽曼：《欧文·拉铁摩尔和“失去”中国》(*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⑦ 艾伯华：《中国通史》(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ird edition, 1969)。

年执教至 1976 年。作为一个极博学和兴趣广泛的学者，艾伯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民俗学研究，以及对最终形成“中国文化”的混合的民族起源的研究。

艾伯华的《中国通史》一书与傅路德的著作相似，但与之前几乎所有的著作都不同，该著作没有将鸦片战争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分水岭，他将整个“满洲王朝”当作一个整体。但是，他坚持认为他以王朝为单位进行的组织并不意味着他认可这些分析单位有实质的一致性。在其著作中的“绝对主义时期”这一章中，有三十页专门讨论清朝。这一章的讨论从元朝开始，把清朝置于更大的时代背景下，该部分以五代和宋开篇，代表“近世”。他写道：“一个朝代的开始和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展示出一个明确的分期。”他补充道，他借用了产生于西方历史的比如“专制主义”和“近世”的分类，这些分类并不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历史是平行发展的，“尽管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中国历史与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一些相似性。”①

什么因素促使艾伯华将宋之后的中国称之为“近世”？他很明显受到他读到的日本汉学家著作的影响（第一代美国的清史学者都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东京学派的历史学家，像周藤吉之、加藤繁和仁井田升等，艾伯华经常引用这些学者的研究。艾伯华声称中华帝国晚期的近代性体现在以下方面，即相对于贵族政治不断增长的君主权威，“个人自由”的兴起，大规模商业和经济货币化的扩张，以及最重要的“中产阶层的出现”。② 这些发展趋势基本没有中断，一直延续到清亡，这使得清朝能够通过与汉族精英的战略合作（艾伯华没有提到满族的“汉化”）以及通过展示出一个受欢迎的“负责任的政府”来建立自己的统治。艾伯华声称，清朝开始走下坡路，与法国大革命的情况相似，根本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压力没有被工业化发展所缓解。这一下降趋势不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在道光时期出现所造成的，尽管“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趋势。③

二战后美国汉学研究由哈佛大学主导，在论述此之前，我们必须要考查战时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的诞生，这一项目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将“清朝”置于美国学者的研究范围。它就是 1100 页的人物传记词典《清代名人传略》的编纂，该书由前传教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1884—1975）任主编，由 50 位来自美国、欧洲和东亚的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国会图书馆花费超过 10 年时间撰写完成。《清代名人传略》于 1943 年首次出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包含整个清朝大概 800 位名人（提供了近 4000 位人物的信息）。④ 在缺乏档案材料的情况下，该书的编纂者主要依靠大范围的出版物（大部分由恒慕义收集，成为东方部的馆藏），包括了最重要的年谱和文集。《清代名人传略》，自出版至今，对英文世界的学者来说一直是极重要和权威的资料。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关于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也许最感兴趣的是它的“前言”部分，由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学者胡适（1891—1962）在 1943 年写于纽约。他赞扬了该书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和公平性”，但是接着他通过该书所展示的大量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他坚持将该书的历史跨度表述为“过去三百年的中国”，而不是“清朝”，满族统治中国是一个自身不断被汉化的过程，虽然“军事征服，长期高压政治，对通婚和采纳汉族习俗的明令禁止”，他写道，“仍然阻止不了**自愿吸收汉族文化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当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时，满人只需要轻易地取一个汉人的姓名，一夜之间就无法辨认，这绝不是偶然的。”⑤ 序言写作的时候

---

① 艾伯华：《中国通史》（Eberhard，3）。
② 艾伯华：《中国通史》（Eberhard，195—99）。
③ 艾伯华：《中国通史》（Eberhard，270—302）。
④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Arthur W. 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Washington：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
⑤ 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Hu Shih，“Preface，” in Hummel，vi. 黑体字系笔者所强调）。

正好是日本人在国际上推动建立满洲国的时期，没有迹象显示胡适高调宣扬的汉族必胜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被该书的主编和编者认可（如果拉铁摩尔读到，他当然会拒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参加这一项目），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视角，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视角受到更近期的美国清史学者的强烈反对。

费正清和哈佛称雄的时代

在 1930 年代和 1980 年代之间，哈佛大学是美国清史研究的绝对中心。其他的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也仅有这两个）也有中国史学者以及零星的研究生，但从研究成效和中心地位上，都无法与哈佛相提并论。原因很简单，因为哈佛有费正清（1907—1991），他从 1936 年—1977 年在哈佛执教，一直到 1991 年他去世之前，一直是那里的领军人物。

对费正清凭一己之力在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中国近代史”这一学科无须阐述太多，需要强调的是他使这一学科贴上他个人的鲜明特征。也就是说，他使得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带上他自己的品味和偏好的同时，也附上了有他重大的盲点，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开始有学者对这些盲点提出挑战。费正清有超乎常人的精力。他为哈佛数以千计的本科生设计了中国史的课程大纲，同时撰写了大量教材，这些教材多次再版和加印。他还介绍许多美国其他大学的学生访问中国。他教授研究生如何阅读清代档案，在哈佛大学出版《中国文丛》期刊，同时推荐他们到美国一百多所高校担任中国历史教职。他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这一中心成为战后其他大学建立各种地区研究中心模仿的对象。他擅长募集基金，并用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钱资助出版《哈佛东亚研究丛刊》，从 1958 年开始直到他退休，该文集累计出版超过 100 部，几乎垄断了新出版的关于现代中国研究的英文著述。除了哈佛之外，他于 1948 年牵头组织成立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该协会逐步成长为亚洲研究协会，在 1958 年，他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建立了国防外语奖学金项目，该项目资助研究生和无数积极上进的美国中国专家进行语言培训。他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为《生活》杂志撰写专栏，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决策方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力量（尽管远非决定性的——他主张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而在这一观点产生影响之前，他一直都在积极推动）。①

费正清出生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该州位于人烟稀少的北方草原，但是从中学起，他即先后就读于埃克塞特学校、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成为英美白人新教徒中的精英。他也许在青年时期受到中西部政治改革家罗伯特·拉的某些自由进步主义的影响,那时罗伯特·拉和费正清家关系密切。他没有（至少是有意识地）接受深深扎根在他家乡文化中的福音派基督教的使命，他在以后的文章里写道，“非理性的信念吓到了我”，“哈佛是我的信仰”（也就是说，是世俗的、探索的人文精神）。但是，对“现代美国技术”种族中心主义的信念在他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处于其精神层面中心地位，这影响了他对清史人物和事件所做出的反应。②

与在美国中西部受到的影响相比，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的经历对他学术兴趣的培养更有决定性作用。在哈佛写完他的关于俄罗斯革命的本科论文之后，他带着转向中国历史研究的模糊概念出发去英国，并被安排与已经退休的马士见面，费正清花了很长时间陪伴马士。马士英美人式的

---

① 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Fairbank’s autobiography,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有着明显的表露，我觉得是作者有意无意为之。也参见保罗·M·埃文斯：《费正清与美国对现代中国的认识》（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② 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Chinabound*, 5, 11, and 126）；保罗·M·埃文斯：《费正清与美国对现代中国的认识》（Evans, 7 and 11）。

帮助中国改革的使命感吸引了费正清的注意。费正清称马士是“我的精神之父”。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经由通过牛津大学接触中国历史是一种“恩赐”：“这使得我脱离汉学的羁绊，通过英国人的眼光接近近代中国，正如西方世界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而这主要是通过英国人的眼光。”① 换句话说，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认识，如果不完全是异国情调的，至少从根本上并不基于他自己的经历。

费正清1932年首次来到中国，开始只能说很少的汉语，但是具备入门的知识，他与一个群体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该群体是“具有英美人一样的自由主义背景，且具有爱国情怀和现代中国心态的中国人，他们和我们一样”②，在这一群体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清华大学蒋廷黻，他指导费正清阅读清朝的档案。蒋廷黻（1895—1965）出生在湖南邵阳（也许不是巧合，这里也是魏源的出生地），11岁时接受基督教信仰，1911年去美国读中学。他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并于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返回中国任教，他在1938年为中国和西方学生写的《中国近代史》成为这一领域的通行教科书（可能多少有些争议）。蒋廷黻在194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驻美国的代表，在1960年代早期是国民党政权驻联合国的大使。

对美国清史研究者来说，第一个真正的史料汇集是多卷本的史料汇编《筹办夷务始末》，这套书是1880年奉朝廷命令编纂的，1930年在蒋廷黻努力下由故宫博物院出版。为了对这一资料进行补充，蒋廷黻又编纂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像费正清一样，蒋廷黻也推崇马士的著作，并将他自己的资料集当做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一书的补充，即补充了马士所遗漏的一些资料。《筹办夷务始末》以及蒋廷黻其他的文献汇编，成为费正清鸿篇巨著《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的主要史料来源。③ 它们也是费正清所培养的一代学生使用的主要文献。

蒋廷黻不仅为费正清提供了语言训练、文献基础，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念。蒋廷黻是同时代历史学者中“现代化”概念的主要倡导者。对蒋廷黻来说，“现代化”意味着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研究方法，尽管他强调这些是历史的终点，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一代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全盘西化的主张。④

费正清研究的核心框架是“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和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很显然都是对蒋廷黻思路的回应，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如前所述，费正清明确将“现代化”当作是对英美模式的模仿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概念（他既是种族优越论者，又怀疑任何的宏大理论）。费正清崇信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等西方价值观，令他不认可蒋廷黻对于中国的主张，比如国民党的“开明专制”和统制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准法西斯主义等主张。

除了来自蒋廷黻的影响，费正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1950、60年代在美国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比如他总是受到来自他哈佛的同事、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影响。帕森斯发明了一系列的“模式变量”，用来描述传统中国之前和之后的社会，

---

① 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Chinabound*, 19 and 22）。

② 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Chinabound*, 128）。

③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original two-volume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费正清在此书中强调蒋廷黻和他所收集的档案在自己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见 xiii 和 536-37 页。

④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二章《现代叙事的起源》（Huaiyin Li,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七章《蒋廷黻和现代化》。

即传统中国的特征是极为“排他主义的”，而现代世界则是“普世主义”的。① 在笔者看来，幸运的是，费正清依据基本的经验主义相信中国在根本上是独特的，这使得他免于受到现在已被否定的理论过多的约束和误导。

1950 年代早期所发生的麦卡锡政治迫害，源于美国认定“失去中国”，这一政治行为对美国的清史研究有深远的直接影响。费正清是国会针对这一问题发起听证会的当然目标，实际上，由于他对国民党不冷不热地支持和对共产党谨慎地接受而受到攻击和调查。但不是费正清而是拉铁摩尔成为美国右翼的重点攻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拉铁摩尔等的学术主张，以分析生产方式和社会力量为主，因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而被污名化，并日益式微。费正清自己的历史研究兴趣在于外交和制度史，在于英国和美国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中国自己非革命的“现代化”，这令他看起来在政治攻击面前是安全的，也许还主导了这一领域甚至比他们所希望的更加主导了这一领域的研究。②

费正清的历史著作建立在几个核心假设之上。首先是中国根本不同于西方，几乎不可知。比如，他写道，中国与美国之间经济发展史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他们两者之间文化的差别”。③ 其次是，他对自己英美人的文化偏见视而不见，他认为中国历史进程比世界上其他社会更加受到文化和观念因素的约束。④ 再次，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几乎没有变化并且陷入了一个“均衡”。尽管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者，费正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持续的演进知之甚多，但坚持强调停滞，将中国看作“被她自己的历史所羁绊的国家”（注意这里使用了女性的代词），特别可惜的是，将共产主义中国看作“人民的中央王国”。换句话说，中国缺乏“现代欧洲的活力”。最后，他认为中国人对外面世界的看法极具种族优越感，陷入一种对其他文化和社会终究是脆弱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⑤ 基于这些观念，费正清自己对历史上中国人屈尊俯就的看法令人吃惊般的切中要害：例如，他写道，必须有耐心地将 19 世纪世界的现实情况介绍给中国人，“正如在学校的孩子。”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费正清是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研究清史的美国历史学家，但“清朝”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他的历史学研究中只占很少的比重甚至没有什么比重。相反，他倾向于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来划分传统和现代。在他两本权威的教材《东亚：伟大的传

---

① 比如，帕森斯社会学理论的条条框框就给费正清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的费维恺的精彩研究带来负面影响。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② 关于费正清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的经历，参见保罗·M·埃文斯：《费正清与美国对现代中国的认识》第六章，以及《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 25 章，自 1958 年开始出版到 1977 年费正清退休这一期间，《哈佛东亚研究丛书》共出版关于中国的专著 81 本，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制度史或外交史。

③ 费正清等：《近代早期中国的经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Fairbank，et. al.，“Economic Change in Early Modern China：An Analytic Framew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1（October 1960），15）。

④ 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参见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外交关系》（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5 and 273）。

⑤ 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Fairbank，*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3，9，and 13）。

⑥ 邓嗣禹、费正清主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汇编》（Su-yuTeng and Fairbank，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New York：Atheneum，1971（original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21）。

统》和《东亚：现代化转型》中都将这一分期奉为圭臬。① 费正清通常坚持两点：一是“现代化”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完全是同义的，这一“现代化”过程是19世纪清王朝所应对的几乎唯一重要的事情。他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的沿海，而很少考虑广大的内陆。为了对这一倾向进行辩护，他写道，“海洋中国，是中国和西方交汇的地方，是现代化开始的地方。”② 后费正清时代的学者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超越这一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武断和扭曲的分期。

与费正清极度强调“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重要性相伴随的是另外一个分析框架，即被费正清和哈佛学派引入清史研究之中的“中国之世界秩序”概念。这是一个非理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建立在皇帝是“天下”的主宰这一信念之上，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中央王国”（中国），根据“朝贡制度”来建立跨文化关系。在费正清之前的几代西方观察家当然也注意到，而且经常嘲笑清朝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但是费正清，受到马士和蒋廷黻的一些影响，异常准确地分析了这一话语建构，不断强调中国需要抛弃这一严重的幻想才能够进入“现代”世界和西方各国的行列之中。在他对朝贡体系的开创性研究之中，费正清仔细考察了清朝与明朝关于朝贡体系运行的差别，但是，他后来逐渐采用了一种与历史无关的论述来概括整个“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③

费正清之后的中国史学者，在分析清朝晚期的对外关系时，都试图努力回避这一过分透支的观念。他的学生，包括外交史学家卫思韩和法律学者爱德华，发现清朝的外交政策更多是建立在现实政治之上而不是基于统治迷信（governing myth）。研究较早时期的历史学者指出，比如在南宋，统治者放弃了“普天之下”的众多修辞以应对他的邻邦。其他的学者已经阐述过，在清朝，据称包罗万象的“朝贡贸易”的经济内容，逐渐减少到几乎空白的程度，只留下朝贡的礼服作为外交展示品，而对外贸易则通过其他很少受到礼仪限制的渠道快速发展。文化史学者比如何伟亚，已经指出18、19世纪西方的外交惯例与清朝基于自我中心的假定和强调仪式正确性的外交惯例在多大程度上相似而不是形成对照。研究甲午战争的柯克·拉森,声称清朝的表现并不完全像是“中央王国”，而是像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认为清朝目光短浅地寻求将朝鲜置于其不合时宜的“朝贡”霸权之下的这一观点，并不能反映清朝对朝鲜政策的现实状态，而现实更多是通过它对反清的日本人宣战反映出来。总之，留给我们的问题是，由于费正清一味强调中国中心主义和朝贡体系的作用，我们一方面需要剥离对这些框架所起决定性作用的过度强调，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能够从清朝统治者和官员杂乱无章的表述中识别出它们。④

---

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材一方面强调将中国历史分为传统和现代，另一方面也强调将中国、日本、韩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历史合并讨论。

② 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Chinabound*，124）。

③ 可比较下面两篇论文，费正清和邓嗣禹：《关于清代朝贡体系》（载《哈佛亚洲研究》）和费正清：《一个初步的框架》（见《中国的世界秩序》）。（Fairbank and S. Y.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2（June 1941），135—246，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58），1—19）。

④ 卫思韩：《使团与幻想：1666至1687年康熙朝的荷兰与葡萄牙使团》（John E. Wills，Jr.，*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K’ang-hsi*，1666—1687，Cambridge MA：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4）；爱德华：《中华帝国的边疆法律》（R. Randle Edwards，“Imperial China’s Border Control Law，” *Journal of Chinese Law* 1. 1（1987），33—62）；罗茂锐：《中国及其邻邦》（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赵刚：《清朝面向大海：中国的海洋政策（1684—1757）》（Gang Zhao，*The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Chinese Maritime Policies*，1684—1757，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何伟亚：《怀柔远人》（James L.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柯克·拉森：《传统、条约和贸易：清帝国主义和朝鲜，1850—1910年》（Kirk W. Larsen，*Tradition*，*Treaties*，*and Trade：Qing Imperialism in Chosōn Korea*，1850—1910，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

在度过 1950 年代初“政治正确”的攻击之后，费正清在 6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早期的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受到来自左翼，即组建“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年轻一代的反战学者的持续批评。最尖锐的批判来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周锡瑞，他指责费正清个人和哈佛学派的“帝国主义护教学”（“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建立了智力和文化的基础。除了批判两本《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的著作（作者分别是侯继明和石约翰（John Schrecker），他们明确地支持西方入侵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积极作用），周锡瑞进一步指出这只是由费正清所概括的“哈佛范式”的一部分而已。不过这一观念可以回溯到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是鸦片战争时期美国的总统，也是哈佛的校友，他设立的那些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的奖学金背后其实有“隐含的目的”。①

正如冷战持续了数十年,② 越南战争进一步使得美国对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分化为“左”和“右”，要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要么是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朋友”。这一新分类部分反映了学者之间的代际变化，部分反映了美国的清史学者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即不仅仅只局限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其扩张远至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它反映了清史研究新范式——“社会史”的成功兴起。

费正清时代的最好标志是多卷本的《剑桥中国史》的出版，这一工作贯穿他整个职业生涯。费正清在 1966 年开始计划这一项目，与他合作的是英国出生的唐史学者崔瑞德。第一卷于 1978 年出版，不出意料由费正清担任主编，讨论的是他最熟悉的 19 世纪。他在针对整个项目撰写的前言中说道：主编“不得不放弃”许多西方读者希望在该卷中读到的内容，包括“关于地方史的丰富的内容”。③ 实际上，仍然有两个明显的例外，一是哈佛的内陆亚洲历史学家傅礼初，二是对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危机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先驱者曼素恩和孔飞力。1978 年的这一卷致力于建立一个权威但主要是复述“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和王朝的衰落这些人们所熟悉的论述。“晚清”的第二卷于两年之后的 1980 年出版，大部分内容与其以往论述类似，但却包括有费维恺撰写的关于经济的章节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re）撰写的社会变迁的章节。再一次，并非巧合，巴斯蒂是法国人，不是在那时候在这一领域具有相似能力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学家。

《剑桥中国史》关于清朝早期和中期的第一卷最终在 2002 年出版，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已规划的清朝早中期的第二卷仍然没有出版）。费正清在十年之前即已去世，这一卷由普林斯顿大学的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任主编。该丛书设定的时间框架显示了其摆脱西方中心框架的姿态。当然，任主编另外一种变化影响更为深远，即在晚清卷出版数年之后，美国学者已经将注意力转而集中在社会史和经济史，而不再是政治史和外交史，这一历史研究倾向在 2002 年这一卷中得到大量呈现，甚至是表面看起来聚焦于各朝一些事件的章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卷

---

① 周锡瑞：《哈佛之于中国：帝国主义的护教学》，载于《关心亚洲学者通讯》（Joseph Esherick，“Harvard on China：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73）），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策略的，政治同情的，或仅仅是礼貌的回应），费正清没有不理会或谴责这些指控，而是在《关心亚洲学者通讯》上以谦恭的、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了反驳。

② 冷战对美国清史研究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是梅谷的著作《太平叛乱：历史和文献》（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three volum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该书由坚定反对共产主义的学者撰写，由作为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研究堡垒的一个大学和出版社出版，是到那时为止关于太平天国最有说服力的著作，同时也是对国民党在评价太平天国历史价值时所持立场（完全是负面的）的系统性验证。

③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晚清”1800—1911，第一部分（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Part One*，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vi）。

包括了曼素恩撰写的“女性、家庭和性别关系”这一章。就这样，清史研究的视野明显得到了扩展。

社会史革命

从 1970 年代开始，美国清史研究开始出现一种转变，这种转变被柯文精炼概括为“在中国发现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时期研究者开始反思并欲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这一思路中解放出来，1970 年代之前的研究议题假定对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历史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有利于西方人理解自身，但从 1970 年代开始，清史研究者开始否定这样预设的假定。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再被当作是一种工具，而是承认它自身所具有的重要性。研究的兴趣现在开始集中到清朝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社会动态等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清史学者坚定地拒绝了在西方冲击之前中国社会是停滞的这一观点。停滞论的重要性虽然并没有被完全否定，但是不再是清史研究中唯一重要的叙述方式。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西方的影响只是表象的。

在英文学术界中，这一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先驱是 1950、60 年代一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他们的著作包括张仲礼（1920—，华盛顿大学博士）1955 年出版的《中国的绅士》，以及 1962 年出版的《中国绅士的收入》，这些书解释了绅士阶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拥有的内在复杂性。萧公权（1897—1981，康奈尔大学博士）在 1960 年发表了《中国乡村》，讨论清朝的保甲和乡学制度安排。何炳棣（1917—2012，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对盐商和会馆的研究值得关注，其代表作有《明初以降的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明清社会史论》等。[①] 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是，并且这些社会史研究先驱没有一个是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些著作中，也只有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是被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出版。[②]

尽管美国年轻一代的清史研究者阅读并推崇这些著作，但公平地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著作代表了清史研究的革命，直到两位学者的著作宣告了这一革命的开始。一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他于 1966 年出版了《大门口的陌生人》，通过讨论鸦片战争对珠三角当地居民的影响，发现新力量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与该书的内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为该书所设计的新颖选题，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代美国学生，都被该书前言中的宣言“让我们进入地方史”所鼓舞。与魏斐德的著作相似，孔飞力 1970 年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同样引人注目，该书以 19 世纪的团练为研究对象，但却超越了轻轻松松的制度分析，并对那时候占主导地位的认为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的思考方式提出了挑战。孔飞力直接质疑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疆界”，并提出一个新问题来判断这一边界，即中央政权的

---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i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萧公权：《中国乡村：19 世纪的帝国控制》（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何炳棣：《明初以降的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Ping-ti Ho, *Studies i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 Series, 1959）；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这不是说哈佛没有出版在美国受教育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实际上，它出版了很多。但是，这些著作都是研究“中国对西方回应”以及制度史的问题，比如，蒙思明：《总理衙门：组织与功能》（S. M. Meng, *The TsungiYamen: 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1962)），和 Ying-wan Cheng《晚清邮驿之演变》（*Pos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ization*, 1860—1896 (1970)）。

代理人与新出现的“地方精英”在地方社会中所发生的权力平衡的转换。①

很多因素影响美国的清史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转向社会史研究。其一是同样引人注目战后历史学关心的话题更加广泛。战后的哈佛时代与美国亚洲研究组织向地区性研究机构转变这一形势相一致，这拓宽了研究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的学者的研究领域，但却也减弱了他们与其他地域历史学者的联系。与此同时，西方历史学者——大部分是那些研究法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杰出学者——开始引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即不太重视英雄人物和大事件的作用，而是关注潜在的“长期”演变的“结构”和“心态”。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在阅读到这些研究后，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在法国旗帜性刊物《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zations*）上发文。比如勒华拉杜里的《郎格多克的农民》，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金兹伯格的名著《乳酪与蛆虫》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或几代的美国清史学者。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学者与东亚其他中国史研究者对话的增加，费正清总是督促他的学生学习日本的中国史学者所撰写的著作，但是他们往往是与费正清在政治史、制度史和更小范围的思想文化史上拥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1970年代的美国学者注意到日本汉学家的研究，特别是（但也不完全是）提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东京学派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包括仁井田升、正敏田中、重田德以及更为折衷的斯波义信），这些数十年来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在麦卡锡时代没有得到重视，因此美国学者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迎头赶上。19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带来了另外一种认识上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以资料为驱动力的、具有高质量的由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这些中国学者包括李文治、傅衣凌、彭泽益、韦庆远等人，他们长期被美国学者所忽视，因为这些美国学者很难读懂这些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修辞。而现在年轻一代的美国和中国的清史学者则更能够积极地分享各自的研究计划。

除了与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接触之外，第三个促使美国汉学界向社会史转变的因素是新的档案资料的开放。费正清和他的学生在使用清朝档案方面走在前列，但是这些档案几乎都被汇编好或已经出版，又或者是被他们的编者自己结为文集，又或者由中国的历史学者收集成册。美国学者直接使用中国的档案资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开放清朝档案。当国民党政府在1940年代晚期退守台湾时，它尽可能多地带走了清朝的档案，相对于存放于北京的整个档案，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部分档案都是精华。尽管这些档案来源多样，但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涵盖了18至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朱批奏折”。美国学者中与这批珍贵史料的关键对话者是耶鲁大学的白彬菊，她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紧密合作，组织和出版了这些奏折汇编，并且在1970年代教授了数批美国研究者怎么使用它们。这些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地方督抚与皇帝对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进行沟通所书写的通信，上述材料对叙述政治和行政史尤为有用（包含了新的细节）。基于这些奏折的代表性研究包括白彬菊对军机处的研究，曾小萍对耗羡归公财政改革的研究，盖博坚对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研究。②但是，通过仔细地阅读这些档案，会发现它们同样有利于社会史的研究，因为它们提供了之前的

---

①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Frederic Wakeman，Jr.，*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the quotation is from page 7））；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Philip A.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②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中国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Beatrice S. Bartlett，*Monarchs and Ministers*：*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1723—182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盖博坚：《四库全书：乾隆晚期的学者与国家》（R. Kent Guy，*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Cambridge MA：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7）。

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提供的关于认识普通民众生活的材料。最有名的两部专著是韩书瑞的《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和《千禧年之乱：1813 年的八卦教起义》。这两本书均基于大量被抓捕者的口供上，这些口供是经地方管理者整理后汇报给皇帝的,[①] 很难说没有经过处理，但是相对于我们之前对于清朝底层群体的声音的了解，这显然更近了一步。

第二阶段是随着 1980 年代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位于故宫的一史馆档案向西方研究者的公开。如果说台湾的档案是冰山一角的话，一史馆的档案就是冰山本身。在一史馆所馆藏的众多档案中，最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题本，报告给清朝中央机构的都被认为是重要的事情，比如当地的天气、收成、城墙维修的费用等等。题本根据六部进行组织，每一个部的题本处理一类事务。对社会史学者来说，最有用的是刑科题本，因为它们包含来自地方的数之不尽的关于命案的详细报告。尽管主题都是命案，但正如中国学者刘永成已经显示出的创造性一样，这些题本可以用来获取社会史学者所感兴趣的大量数据，比如关于农村的租佃合约、雇佣关系。美国的清史学者热切地跟进这一研究形势。[②]

最后阶段是县级档案的发现和利用。大部分外国学者一直认为经战争和 20 世纪早期发生的各种破坏性事件后，没有系统的地方档案能被保留下来，直到 1980 年代初四川重庆巴县档案被发现，才意识到部分地方，档案近乎奇迹般地被完整保存了下来。这批档案包括数以千计的刑事案件的完整文件、土地清丈以及其他的文件。这些地方档案使得美国学者在租佃合约、地方的诉讼实践、胥吏的心态和活动、地方的性别规范和对它们的侵犯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最著名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和他的学生们）。[③] 与此同时，对其他高度地方化的非政府性质的档案收集，再结合地方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也为理解商业组织、亲属关系以及清朝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提供了新途径。[④]

展示美国清史研究进步过程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对终结清朝及其帝国制度的辛亥革命的研究。第一篇美国学者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专题论文出现在 1925 年，该论文，是关于中国“国父”孙中山的圣人传。[⑤] 当美国的学者后知后觉注意到不是某一个英雄人物（正如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促成了革命后，我们的视野扩大但仍局限于孙中山周围的职业革命家圈子，比如黄兴、

---

① 韩书瑞：《千禧年之乱：1813 年的八卦教起义》和《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and *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美国社会史学者基于刑科题本所做研究的最好例证是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 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Thomas M. Buoye, *Manslaughter*, *Markets*, *and Moral Economy*：*Violent Disputes over Property Righ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Philip C. C. 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办差役》（Bradly Reed, *Talons and Teeth*：*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 Matthew H. 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曾小萍：《明清四川佃农的权利：基于与土地相关的巴县诉讼档案的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Madeleine Zelin, “The Rights of Tenants in Mid – Qing Sichuan：A Study of Land – Related Lawsuits in the Baxian Archiv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 3（1986））。

④ 曾小萍：《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Madeleine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宋怡明：《中华帝国晚期的血缘、家族及继承》（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林百克：《孙逸仙与中华民国》（Paul Myron Wentworth Linebarger, *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and London：Century, 1925）。

宋教仁等。[①] 随后，学者的注意力转向更年轻的与孙中山联系不那么紧密的革命家，比如邹容和秋瑾等，以及对革命有可能起到帮助的改革者，如梁启超，他并不公然地支持革命。[②] 但是直到美国学者开始研究地方社会之后，才开始对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历史不是伟大人物的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故事），而是关于一群有着相互利益冲突的联系松散的地方势力的故事。这些研究中最有理论建构的研究是周锡瑞对湖南和湖北的研究，该研究认为革命的引擎是他称之为“城市改革精英”的群体，他们是支持现代化和善待商业等一系列事件中的主要力量，他们使得由于混乱而产生的民粹主义势力难以生存。并不是马克思认为的“资产阶级”，周锡瑞的城市改革精英是小规模的工业资本家、新兴的白领专业人士、传统商人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某些进步势力的混合体。[③]

从这一意义上，周锡瑞的著作与同时期的其他论著一起共同推动了清史研究中新社会史的主要问题，即研究“地方精英”。相对于“绅士”，这一概念更受青睐，它强调了这一地方群体的权力建立在资产和科举功名的基础上——后者是第二位重要的。从孔飞力对 19 世纪中期精英主导的地方军事化的研究开始（在 1980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前言中，孔飞力认为这一过程也许实际上在半个世纪之前即已出现，即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进行的动员）[④]，一代的美国青年学者致力于研究某些特定地区的精英行为。[⑤] 这些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是冉玫烁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精英能动主义”的研究。作为对孔飞力之问“现代历史的边界”的回应，冉玫烁仔细地描绘政府之外的精英针对世纪中期的大叛乱，首先是组织起来重建地方的基础设施，然后随着《申报》和其他报纸的出现，他们开始与其他地区的能动主义者开始互动（特别是在1870 年代华北大饥荒的时候）去扩展他们的组织活动以救济他们家乡之外地区的困难，最终他们确信他们可以比衰弱的清政府更好地制定和执行国家的政策，即清政府逐渐被认为是多余和无

---

①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XueJundu，*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刘吉祥：《宋教仁与辛亥革命》（K. S.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② 参见芮玛丽主编的里程碑式的一本书：《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Mary Clabaugh Wright，*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特别是冉玫烁（Mary Backus Rankin）和 张朋园的文章。

③ 周锡瑞：《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Joseph W. 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有关其他 1911 年的本地社会史研究，参见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Edward Rhoads，*China' 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以及谢文孙：《珠三角的农户起义与市场层级，1911》，载伊懋可和施坚雅主编：《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Winston Hsieh，“Peasant Insurrection and the Marketing Hierarchy in the Canton Delta，1911，”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④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Preface to the 1980 paperback edition.），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孔飞力将地方精英自治这一概念的文化来源追溯到顾炎武对封建制度的构想。孔飞力：《民国地方自治下的控制、自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和卡罗林·格兰特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Kuhn，“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 in 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257—298）。

⑤ 对这一代学者作品的汇总，代表性的是周锡瑞、冉玫烁主编的《中国的地方精英与统治模式》一书（Esherick and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同时接受和认可美国宋史学者韩明士（Robert Hyme）的命题，即在中华帝国中期出现了“地域转向”（localist turn），精英阶层远离国家范围的网络，转而将他们的利益集中到他们所在的地域。参见韩明士：《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效的。这就是辛亥革命真正的长期起源。①

冉玫烁在这一著作中也做了一个尝试，这一尝试证明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包括但也不仅仅是清史研究——非常重要：她将这些地方精英的竞技场命名为“公共领域”。“公”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无处不在，冉玫烁描述了相对于“私”和“官”，“公”是集体行动范围的扩张。包括笔者在内的其他学者，研究了这一有力概念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对早期近代欧洲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等概念的关系。② 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研究在1990年代成为世界范围内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学生的学术时尚。由于苏联的解体，它们似乎具有强大的当代意义。但是，在清史学者中，这些概念不仅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也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一些批评，比如魏斐德发现这些概念是刚愎自用的产物，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政府总是足够强大，以致任何类似于西方“公民社会”的组织难以出现；其他人，比如黄宗智声称，在清朝，在国家和私人之间存在着“第三领域”（third realm），但是他用了一个从欧洲历史引申出来的概念来命名它，这一概念比它揭示的内容更为模糊。③

社会史革命引发了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中的空间和时间概念认识的巨大改变。人类学家施坚雅在他1964—1965年的系列论文和1977年主编的书中，基于区位理论、地理中心理论和地区分析理论，直接挑战了我们对空间组织的理解。④ 在对大部分历史问题进行研究之后，他指出，研究中国最合适的分析单位不是将中国当作一个整体，也不是省，而是“地形学上的大区”（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基于他对商品、人口和信息实际流动的分析，他发现近代晚期中国分为九或十个大区，大区内有排水系统，以自然的河岸作为边界，包括离散的嵌套于中心的层级结构。每个层级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七级，处于中心的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大都市，逐渐延伸到最外缘的周期性集市。

施坚雅说明了他所提出的研究框架的若干应用。这些应用中的一个是，每一个大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衰落周期都是独立的，并不必然是同步的，有时经常是相邻的大区呈现相反的发展方向，因此，如果长江下游相对于华北在衰落，即声称整个帝国都在衰落就没有什么道理。其次，在空间层级的更底端，村庄组织不是“一盘散沙”，它们实际上与处于“标准”市场和“中级”市场中心的更大的地方交流中心联系在一起，它的买家来源区域与其实另外一个相互重叠，这扩大了农村居民的文化视野，使得超越个个小的居住区，基于更大目标的动员（比如军事化）总能成为可能。

---

① 冉玫烁：《中国的精英活动与政治变迁：浙江省，1865—1911年》（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罗威廉：《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载《近代中国》（William T.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6. 3 (July 1990)）。

③ 魏斐德：《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争：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反思》，黄宗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第三领域》，均载《近代中国》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both in *Modern China* 19. 2 (April 1993)。

④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3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hree part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3 (1964—65)）；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施坚雅的理论有一段时间内遭到激烈批判，一个事实是，他过于强调模型的解释力。① 但是对大部分中华帝国晚期的美国历史学者来说，接受他所推广的概念和词汇显得容易。首先，通过将他的整个模型建立在“交易”是中国人生活的基本活动这一假定之上后，研究者们激发出对鸦片战争之前非常重要的商业和城市这一领域的研究。大部分美国学者现在会同意，与之前认为西方“引入”或“引领”了中国 19 世纪商业活动这一陈旧观点相反，涉外贸易在清朝从来没有在贸易量和贸易价值上超过已经存在的长距离国内贸易，更不用说更大规模的跨地区贸易，进一步说，清朝到 18 世纪已经深度卷入了东亚的跨地区海洋贸易。一系列基于施坚雅工作的对主要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的研究，直到今天依据势头不减。②

随着社会史成为新的中心，它也为美国学者对中国过去几个世纪历史分期的争论带来了变化。基本上，以鸦片战争为界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被新的学者所放弃。基于这一点，站在左边的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毒害作用的学者和站在右边（或者说中间）的强调“现代化”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学者已经在一个观点上达成共识，即西方的影响，不管好与坏，是中国近期历史时期（也许是所有历史时期）唯一的压倒一切的分界点。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并没有忽视西方带来的强制变化（当然一些学者可能对此强调过多③），他们现在将这些变化仅仅当作许多因素中的一种，也许对于界定我们用于分析历史变迁的时间单位来说，这些强制的变化没有那么大的决定性意义。

一项直接的行动是重新思考将“清代”作为一个独立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此前的一些历史研究被以“清史”的名称组织在一起。④ 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式断代史的反感使得大多数美国中国史研究并没有这么做。一个突破性的时刻是芮玛丽和她的学生史景迁于 1965 年在耶鲁建立“清史研究协会”并创办通讯类杂志《清史问题》。两年之后，何炳棣在亚洲协会发表了他的主席就职演讲，题目是“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演讲中，他将清朝看作一个有凝聚力的历史实体，即使是面对汉族的爱国感情时，仍能有效应对，他认为清朝这一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而清朝的统治能力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⑤

但是在这一时期，清朝被当作是一个独立时期，其他划分时期的方式在美国也有信徒，最广为接受的概念是“帝国晚期”。⑥ 1985 年，当《清史问题》决定更改刊名以使得它显得不是那么域外的味道，它不是选择了《清史研究》，而是选择了《中华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 Chi-*

---

① 芭芭拉·桑兹和马若孟：《中国历史的空间分析方法：一个检验》，载《亚洲研究杂志》；卡罗琳·卡地亚：《地理观念的起源和演化：中国的大区》，载《近代中国》（Barbara Sands 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1986）；Carolyn Cartier，“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a Geographical Idea：The Macroregion in China，” *Modern China* 28（2002））。在孔飞力 1970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第 82—87 页），他已经阐述了施坚雅的市场模式在研究地方史方面的用处和局限。

② 一个早期的例子，参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William T. Rowe（Early Modern），*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③ 这一趋势使得孔飞力在 1990 年代呼吁，既然我们对近代中国西方化转变引入之前的原有环境有了更加丰富和动态的认识，我们应努力“将西方重新引入”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去。

④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T’ung-tsuCh’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⑤ 何炳棣：《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载《亚洲研究》（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February 1967））。

⑥ 最早在清史研究专著中使用这一术语的是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

na）。① 对很多人来说，这一词汇有效地反映了“蒙元之后的历史”，它包括了明朝和清朝在内的所有时期。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一名称只反映了明朝的后半段和整个清朝。标志这一时期开放现象的是不再只叙述朝代的政治状况的变化或外族入侵，而是与西方历史中“哥伦比亚大交换”，即欧洲对新世界的殖民相关联的社会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和欧洲，新大陆饥荒作物的引进引发了人口增长和“现代”模式的加速，16 世纪美洲白银的进口有助于国内贸易的加速扩张，这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商业革命”，这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一条鞭法”改革中农产品流通税增长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作用甚至超过欧洲。1977 年，魏斐德总结了部分“社会史学者”向“帝国晚期”研究框架转变的状况，识别出 1550 年代以来的下列特征：“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互助劳动的货币化支付，某些地区贸易的发展，居民识字率的增长和乡绅规模的扩大，地方管理活动的商业化，以及由此引发的行政和政治变迁。”②

但是，一些社会史学者，包括笔者，倾向于使用“早期近代”（Early Modern）这一概念来对应晚明和清朝，这个概念在西欧的历史学中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早期现代性的社会特征在帝国晚期中国的应用也许包括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包括移民和寄寓），更加复杂的阶级结构，联络的新方式（宗族，同乡会，行会，各种拜把结盟，以及随着这些广泛兴起的各类慈善组织）。从文化上看，这一时期不仅带来更高的识字率，具有“中产阶级趣味”的公众阅读（特别是在市民当中），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市场化（比如，书面合约更为广泛的使用），对个人主义更加赏识（个人和审美），以及从更严格的想法看，一种适度“异议”的文化。尽管近代早期的名称获得了十分广泛的使用，但对这一概念在数之不尽领域的应用都有直言不讳的批评。一些学者觉得这一名称在描述明清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公共领域”的真实变迁方面是失败的，认为将这一引自西方的概念应用于中国后所造成的模糊叙述比它所能揭示的内容更要多，另外一些人则担心这一概念的应用看起来是十足的“现代化”目的论。但是，这一概念直到现在仍被美国的清史学者频繁使用。③

“文化史革命”对美国清史研究的影响

尽管文化史研究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历史书写至少已有十年，但直到 1990 年代初美国的清史学者才开始采用文化史的研究视角。构成这一“清史文化史革命”的，至少有三方面独立且又相关的思想上的取向。

第一部分是认识论上的质疑，这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我对这一名称的理解是，它试图超越自鸣得意的“现代主义者”建立在对档案和历史文献细致和价值中立认识基础之上的自信，

---

① 改名后的杂志仍然是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通常是年轻的学者对清史研究新方向的探索。（也有将期刊名译作《帝制晚期中国》等的——译者）

② 魏斐德：《绪论：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控制的演变》，载魏斐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冲突与控制》（Frederic Wakeman, Jr.,“Intro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Local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Wakeman and Grant, *Conflict and Control*, 2）。

③ 在美国，首次在学术著作中使用“近代早期”这一名称的可能是罗溥洛所著《近代早期中国的异议》（*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The “Ju-lin-wai-shih”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我自己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出现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一书中（*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对使用“近代早期”这一术语的优缺点的广泛讨论参见司徒琳编：《清帝国在世界历史时间中的形成》（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对近代晚期中国思想史使用这一术语的一个高深的讨论可参见，伍安祖：“‘近代早期’：划时代的概念和帝制晚期中国思想史”，载《世界历史》（On-cho Ng, “The Epochal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1（2003））。

而会逐步导致对历史上真实发生事件所采取的“实证主义”态度。温和的后现代主义瞧不起“社会史”这一称谓，即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对历史过程的理解这一做法，而更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则对使用经验档案进行研究的行为表示绝望，认为过去的历史要么是无法被认识，要么是只能依靠主观来解释。①

第二类与之紧密相关的观点是认为历史学家成功从历史资料中发现的不是“事实”，而是某种“表述”方式，这一观点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福柯的深刻影响。所有历史上被认为是存在的实际上只是文化建构和妥协的产物，再进一步以不断演进的“语言”习惯来进行调和。尽管上述观点也对历史真实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但它比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历史研究是死胡同这一观念要好一些，实际上，它也被证明引发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即对历史语言使用和仪式的研究。在美国支持这一观点的大批历史学者中，代表性的学者包括：何伟亚对 1793 年马戛尔尼出使清朝时礼仪与仪式（比如“叩头”）体系的冲突和迷信的分析；刘禾对在理解清朝与西方的文化和政治过程中，翻译和命名（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这一矛盾角色的考察。②

文化史的第三个方面来自欧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权”的观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和强制力的武器，还存在文化武器，利用这一武器，社会中的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社会(也就是西方)，也许会维持和复制它对其他阶级和社会的主导性地位。在从事文学研究的爱德华·萨义德里程碑式的著作《东方主义》中，他声称由于西方对“东方”占主导地位，这些文化武器包括将东方社会描述成是“另类”的，是风景如画、异国情调、孩子气或阴柔的，因此是不够理性的，需要西方（成熟、理性的）的引导。萨义德的论点主要是针对中东的伊斯兰人民，但很快他的观点也被用于中国和东亚的其他国家、地区。③

由文化马克思主义，正如被所谓的“属下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school）的南亚理论家所使用的，也产生出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被美国的清史学者迅速采用，即“后殖民时代研究”。例如帕忒·察特杰就认为,即使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前殖民地仍然认为采用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形式——著名的民族国家——是他们加入“现代”或“文明”世界所必须的。④ 这一自我霸权主义被某些西方化的精英用于验证前殖民地到国内的政治统治者所具备的文明状态。当将这些观点被富有成效地运用于中国的一项研究中时，杜赞奇称之为“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杜赞奇指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去接受民族国家这一基于西方历史过程的产物，比如，就中华帝国历史目的论的结果（teleological outcome）而言，为什么不是太平天国?⑤

正如更早时期，反战的美国中国史青年研究者团结在新创杂志《关心亚洲学者通讯》周围

---

① 也许最著名的论述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何伟亚：《怀柔远人》（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刘禾：《帝国的碰撞：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对萨义德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的一个早期讨论参见 Michael Dalby, “Nocturnal Labors in the Light of Da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 3 (May 1980).

④ 帕忒·察特杰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⑤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质疑近代中国的叙述》（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杜赞奇并不是要放弃整个“历史”逻辑，他只是简单地将历史逻辑从某种特别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

一样，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团结在杜克大学出版社的新期刊《立场》周围。这一期刊的第二卷在1993 年出版，包括一篇由人类学者冯珠娣和历史学者何伟亚撰写的文章，该文扮演了中国新文化史研究宣言的角色。① 与他们的前辈相似，冯珠娣和何伟亚重复了对哈佛学派“中国对西方回应”的批判，但是接着对研究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史学者进行了指责，指责他们犯了与实证主义和东方主义同样的错误，这两种思路都不公平地将从西方推演出来的类别分析——不再原始的“现代化理论”，而是更为广泛的美国的社会科学“工具箱”，强加于中国的历史过程。他们直言不讳地将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放入了这一西方工具箱，特意与先辈的批评者保持距离。

文化史对美国清史研究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一是女性和性别，二是民族和种族。女权主义理论已经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中心组成部分，这逐渐影响到对清史的研究。第一个任务就是地从清朝的大量文献中——政府档案、男人文集、族谱、方志中间发现女性。最容易找到两类女性：叛乱分子和革命者，诗人。冉玫烁 1971 年对民国革命者秋瑾的研究要早于这一运动，其起到了激发后来女性主义学者开展研究的作用；晚明和清初的女性诗人引发了一系列学者对她们跨越不同身份的现象产生兴趣。②

理论上说，引入清代女性史研究最关键的步骤是对“女性”类别的去本质化，《立场》杂志的主编白露甚至声称，于西方引进之前，具有涵括性的“女性”这一类别在中国文化的词汇中并不存在。通过更为仔细的研究，比如费侠莉对“妇科学”的演变的研究和曼素恩学者对“烈女”的研究，使研究者探寻到女性角色的实质一面，即性别不是自然的或与生俱来的，而是基于文化构建的，有具体历史情境，并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被积极协调。曼素恩和其他历史学者从欧洲历史中借用了上述概念，她们并尝试“女性问题论战”（“*querelle des femmes*”）的展开，这一争论是文人作品对由社会和经济变迁所导致的性别角色的变化的激烈讨论。清朝文化将如何应对这些事实，即识字的女性越来越多，并频繁出现在工作场所、妓院、宗教朝圣活动，等等。③

在世纪之交，美国对清朝妇女史研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对女性能动性的强调。在清末民初的

---

① 冯珠娣和何伟亚：《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中文化的概念》，载《立场：东亚文化评论》（Judith Farquhar and James M. Hevia，“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east asian cultures critique* 1. 2（Fall 1993））。

② 冉玫烁：《早期的中国革命家：1902—1911 年沪浙的激进知识分子》（Rankin，*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1911，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尽管研究的是稍晚的时期，柯临清《从社会性别角度看中国革命：1920 年代的激进妇女、共产党政治与群众运动》一书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作，也影响了清史研究（Christina Gilmartin’s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华晚期帝国》（1991 年）将丰富的特别是 1990 年代的对女性诗人的研究以特刊形式出版（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Late Imperial China*（13. 1，1991）brought together examples of the prolific work done on women poets，especially in the 1990s）。

③ 白露：《女性的理论化：妇女、家庭、国家》（Tani Barlow，“Theorizing Women：*Funü*，*Guojia*，*Jiating*”），载司徒安和白露主编的《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主体与力量》（Angela Zito and Barlow，ed *Body*，*Subject*，*and Power in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Charlotte Furth，*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曼素恩：《清朝家庭、阶级和社会结构中的寡妇》，载《亚洲研究杂志》（Susan Mann，Widows in the Kinship，Class，and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Qing Dynast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1（1987））；罗溥洛：《变化的种子：对清早期和中期清朝妇女的反思》，载《印迹》。（Paul S. Ropp，“The Seeds of Change：Reflections o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in the Early and Mid Ch’ing，” *Signs* 2. 1（1976）；最全面的著作是曼素恩的《缀珍录：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女性主义者（主要是男性）着重强调中国女性在儒家文化和社会中是受害者，是腐朽旧中国的遗留，他们意在通过现代化或西化予以纠正。美国学者撰写清史时，过去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倾向于同意将女性描述为受害者。但是最近的历史学家比如曼素恩，受到女权主义理论和西方性别史的转变的启发，开始强调不是个人能动性的范围，尽管是有限的，允许女性在清朝社会，以及女性对这一能动性的决定行为。这些历史学者中，最引起争议的是高彦颐，她尖锐地指出要克服这种所谓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五四史学”。尽管高彦颐并没有引用，但看起来似乎受到“属下学派”学者拉塔·曼尼的影响,后者声称，南亚寡妇殉葬的行为即使受到西方和印度国家主义改革者的奋力谴责，也无可厚非。① 类似地，高彦颐声称清代的妇女缠足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女性是受害者的证据，至少在妇女团结和身份认同上它存在积极一面。②

在所有有关清朝女性的著作中存在这样一个的问题，它所关注的所有对象——诗人，女才，当家人，甚至革命者，几乎全是读书的精英。怎样从这一小批上层女性往下看，即在没有留下多少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还原占最主要部分的清朝普通女性的生活？在各种各样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研究中，在方法论上最为自觉的是贺萧对晚清和民国早期上海妓女的研究。类似高彦颐对缠足的研究，贺萧选择保留对妓女制度本身的道德判读，而不是努力恢复这一多样“属下（Subaltern）”（半殖民的、女性的、经常极贫且没有自由的）群体——诚然具有混合的成功——生活经验的痕迹。③

除了对性别史的关注，文化研究运动也推动了美国清史学者对种族的重新思考。这首先是由柯娇燕对“满洲”的一项研究所引发，过去很少有美国的清史学者费力学习满文，完全只依靠汉文的官文书。当然，大家知道存在用满文记载的与汉文并行的档案，但是大部分学者满足于认为满文只是简单地、几乎完全地复制了汉文。柯娇燕和其他少数的历史学家努力学习满文，发现两种档案间存在着细微但是系统性的差别，当考虑这种系统性的差别时，满文档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有重大意义的不同视角。④

柯娇燕对满文档案的使用使得她能够对满洲的性质和清朝本身进行根本性的再评估。中国的民族主义学者开始倾向于将清朝的统治者描述为独特的种族，他们的故乡在东北，他们占领了中国以及在这一过程之中不可避免地“汉化”或者被汉族人同化。朝廷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特别是在乾隆时期，即以阻止入关之前的满洲文化被汉文化侵蚀，但是这一目标失败了，到 1911 年，满人几乎消失不见，被更大规模的汉人所同化。尽管早期的美国学者比如拉铁摩尔和梅谷早在 50 年前就已表达了这些看法,⑤ 但柯娇燕在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中，系统地展现了与此完全相反的叙事，这受益于西方更广泛的“身份认同研究”。根据柯娇燕的研究，在第一次准备对明朝进行征服时，并没有“满洲”这一种族群体，和其他族群身份一样，他们也是一个历史的文化建构，

---

① 拉塔·曼尼：《有争议的传统：殖民地时期印度的殉葬》，载《文化评论》（Lata Mani，“Contentious Traditions：The Debate on SATI in Colonial India，” *Cultural Critique* 7（Autumn 1987））。

②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和《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Cinderella' 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③ 贺萧：《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Gail Hershatter，*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④ 柯娇燕和罗友枝：《满语概要》，载《哈佛亚洲研究》（Pamela Kyle Crossley and Evelyn Sakakida Rawski，“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1（June 1993））。

⑤ 在梅谷开创性的研究《满族统治中国的源起》中（Franz Michael，*The Origins of Manchu Rule in China*：*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se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2（dedicated to Owen Lattimore）），他指出，“同化理论”错误地认为满洲人采用汉族的技术是因为他们迁移到了长城以南，而没有看到满洲人在征服汉族之前对这些技术有选择地和刻意地采纳。他指出“在满洲人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中国血统，满族人从未完全吸收汉族文化。”

乃有意为之，尤其在皇太极统治时期。征服明朝的军队在种族上是折衷的，在这一系统中，种族身份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单位（八旗制度），但在实践上是可以变化的。因此将新朝代的创建者视作“清征服组织”比称为“满族”更有道理。乾隆皇帝增强“满洲之道”的努力，被早期的学者视作最后挣扎，在柯娇燕看来，这更像是建构文化的新努力，而在 1911 年，满族自我身份认同超过了 1644 年。① 接下来的研究对柯娇燕的修正模型又提供了一些修正，② 但是大部分美国的清史学者至少以一种较弱的形式接受柯娇燕的解释。

正如对满族的研究，美国清史学者在对清时期少数族群进行研究时反对强调本质或生物学上的身份，而是关注文化建构的流动和协商过程。比如说客家人，是汉族人中经济比较弱势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对陆地生产系统的熟练开垦创造优势，逐渐成为一个普通的“族群”。像蛋民这样在福建和广东的少数群体，显示出他们能够通过经济成功和亲属政治的复杂过程，以及对新身份和家庭历史的协商而完全被接受为汉族的成员。③

类似的研究视角也被用于对明朝统治下边疆地区族群的研究。在 21 世纪转折时期，美国历史学界非常关注清朝将帝国的疆域扩大了一倍这一事实，它留给继任者经过极大扩张的、正如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这些新的研究多是关于西南、西北和台湾等边疆地区的，都坦然承认清朝是一个可辨认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实践者（正如它也是西方和日本类似政策的受害者一样），也是对边疆民族身份简单目的论的“汉化”模式的拒绝。④ 通过文化研究，他们认为，民族形成的过程并非无迹可寻，它由博弈而来，疆域，进一步说，像地图、游记、绘画以及“其他”类似的表达，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⑤

美国的学者从“文化史革命”中所接受的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转变是，清朝与明朝存在根本的不同，它并不是简单地是中华帝国历史悠久赓续朝代的殿军（它当然是最后一个）。1996 年，罗友枝在亚洲研究协会发表主席就职演讲的时候，重新评价了何炳棣 30 年前就任该协会主席时

---

① 柯娇燕的观点最完整的阐述是在《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民族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一书中。关于满人在清朝结束时仍然存续下来的一个有力地论证来自路康乐：《满与汉：1861—1928 晚清和早期共和国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② 例如，欧立德（Mark C. Elliott）提醒我们在整个清代，汉族和清八旗兵之间的日常交锋看起来非常像种族冲突，见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梁肇庭：《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族群性》“Helen F. Siu and Liu Zhiwei, 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载柯娇燕、苏堂栋主编：《帝国之于边缘：近代中国文化、族群性与边界》（Crossley,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l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宋怡明：《中华帝国晚期的血缘、家族及继承》（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帝国之于边缘：近代中国文化、族群性与边界》包含的文章是这一支丰富的文献的代表，没有包括在该论文集里面的是纪若诚的工作，见若诚：《亚洲的边地：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变迁》（C.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 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这一著作特别强调不赞成简单的汉化模式。

⑤ 河罗娜：《清朝殖民地事业：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志与地图》（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邓津华：《台湾的想象地理：中国殖民写作及图片，1683—189》（Emma Jinhua Teng, *Taiwan' s Imagined Geography：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的演讲。她赞成何炳棣认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这一大胆的论点，但她提出她不同意何炳棣关于满族汉化的假说以及他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是因为他们汉化得如此彻底，对罗友枝来说，恰恰相反，清朝的成功正是由于他们维持了他们与汉族文化的差异，以及他们对他们内陆亚洲自我身份的认同。这被认为是西方清史学界向“内陆亚洲”转向的决定性的转折点。[①] 在《美国历史评论》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柯娇燕总结了对清朝的新认识，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统治者采用了多样化的统治方式（天子，可汗的可汗（Khan of Khans），转轮圣王菩萨（Chakravartin bodhisattva），以适应不同的统治区域，在这些统治区域中，汉族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数量最多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②] 当然，根据历史分期，对清朝独特性的重新强调使我们稍微远离了“帝国晚期”这一建立在对明末社会和经济变迁因素之上的分期，而返回到朝代历史模式，内陆亚洲秩序的建立现在被视为是早期近代转型的决定时刻。

清史研究的全球化

从 20 世纪末期到 21 世纪初，美国清史研究中一个主导性、普遍性的趋势是清史研究的全球化。这一全球化趋势包括两个影响广泛的方面：一个是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复兴，一个被称为“欧亚转向”。

比较政治经济方法已经产生出两种富有创见的模式，分别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彭慕兰建立（由于他们的支持者在地域上的相似性，这一研究视角也被称为清史研究的加州学派）。[③] 尽管黄宗智和彭慕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双方在很多基本点上还是一致的。两者都注意到缺乏持续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帝制晚期的工业化等现象。两者都通过与西欧的经验特别是英国的经验进行比较来衡量这些现象。两者都发现中国本土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不存在“中国对西方回应”的问题，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发现来自欧洲的替代影响，既没有推动因素，也没有限制因素。双方都逐步承认存在于近代早期中国引人注目的跨地区的商业化。

他们主要的分歧在于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的原因和时点。黄宗智认为中国未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路径驱动的，是人口、生态和文化因素的作用结果，但失败至少也和晚明商业革命一样重要。在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只有土地所有者（不管规模多大，或者是否有永佃权）才被赋予完整的人格（进而可以结婚和传宗接代），再加上生态环境的制约，快速的人口增长使清帝国的农业朝着内卷化发展，劳动力的边际效益逐步下降。由于剩余劳动力未能转移，或是走出家庭农场成为报酬更高的无产工人，效率极度低下的小家庭生产者仍然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基础。

---

① 罗友枝：《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载《亚洲研究杂志》（Evelyn S. 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i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ember 1996））。

② 柯娇燕：《中国的统治权》，载《美国历史评论》（Pamela Kyle Crossley，“Review Article：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5（December 1992））。

③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Philip C. C. 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and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彭慕兰：《大分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R. 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尽管没有完全放弃失败的故事，由黄宗智所保持和复兴，彭慕兰明确反对将中国当作西方经济过程的一个相反的例子。他通过展示详细的证据以表明，直到 18 世纪后期，清朝的平均生活水平至少与西欧是一样的，进一步说，在中国经济思想和实践中，很少有阻止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或工业化的因素。因此，决定性的因素不是路径驱动的，而是“失常的”，换句话说，是历史的偶然。具体而言，清朝被证明没有足够的（或者是位置不好）化石燃料的供给，以及没有获得欧洲在新大陆殖民获得的好财运（主要是非洲的奴隶），结果是欧洲解除了“土地约束”，而土地在当时的西方和东方对生产率的突破都是阻碍。

第二个全球化的趋势是努力超越二元史学，即避免将东方和西方分开处理，而是将二者视作单一的世界历史过程中有相似变化的两个对象。① 濮德培、狄宇宙和罗友枝等学者基于对“内陆亚洲转向”的修正认识，呼吁这一新的“欧亚转向”，他们认为清史与明史的共性很少，但与同时期欧亚大陆的罗曼诺夫王朝与奥斯曼王朝有很多相似性。这些帝国都很相似，都是多民族的帝国，都有扩张的冲动，这一冲动由近代早期与众不同的新军事和行政技术所支持。在一项不朽的研究中，濮德培描述了清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给中亚近代早期同样具有野心的准噶尔蒙古人所带去的压力，并最终将其消灭，因为准噶尔蒙古人没有向其他两个王朝一样有富裕的农业经济基础。这一新的美国历史研究不仅建立了一个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对清帝国的合理叙述，也进一步强调了它在中国长期朝代历史中的独特性，并尝试将清朝处理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单元。②

关于清史研究：我们现在站在哪里了？我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我们将往何处去？

从 19 世纪末期到 21 世纪初期，美国的清史研究，基本是一个对传统认识不断进行质疑的过程。对清史的认识，从一开始仅仅被当作理解西方社会历史的工具，逐渐发展到被认为是有自己独立发展轨迹的历史。基于西方经验基础上的关于历史时期的一般化模式，从认为清朝历史也应该按照这一模式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西方的历史仅仅是西方自己的地方史这一认知上。关于大清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失败的故事”虽然没有被全部推翻，但已经被前文提到的众多著作所质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清朝的历史不再被认为在西方入侵之前是“静止”或“停滞”的，而是有自身的动能，这种动能超过了被当作决定性分水岭的鸦片战争的力量。

进入 21 世纪，美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很明显地转向了民国时期，特别是转向对大城市历史的研究，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社会、经济、文化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历史前身很可能会从上述大城市的研究中被发现。大量研究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从多个视角构建、理解难以厘清的“现代性”。但是，如果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史研究已经如日中天，这意味着这一研究倾向的发生显然是美国清史研究在问题和主题选择方面非常宽泛而衍生出的结果。

---

① 对于这种立场的概述，关注的是南亚和东南亚，见维克多·利伯曼：《超越二元历史：欧亚大陆再造》（Victor Lieberman, ed., *Beyond Binary Histories*: *Re-imagining Eurasia to c.* 183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对以这一方式看待清朝的开创性地建议来自傅礼初（Joseph Fletcher）“*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1985）。

② 濮德培：《西征：大清帝国对中亚的征服》（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也参见罗友枝：《清的形成与近代早期》（Evelyn S. Rawski, “The Qing Formation and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载司徒琳主编：《清帝国在世界历史时间中的形成》（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and also articles by Perdue and di Cosmo in the same volume*。

一般地说，在历史学学科中，主要的进展是将之前认为不发生变化或者至少是非历史学的因素导入到历史学的研究之中。在这些要素中，最主要的是人体和环境。在美国，对中国历史中人体史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我们已经研究了性行为、性身份，这些对象出人意料地充满了变化。① 其中，也有研究针对生殖，它既被当作生物学和医学的事件，也被当作理解文化变迁的工具。② 比如对健康与疾病等文化概念变迁的研究被视作很重要的工作，③ 研究关注身体创伤对行为和文化的影响，如缠足，纹身，残疾和死亡等。④ 即我们已经关注到清前期的历史对民国时期健身和体育造成的影响，⑤ 也开始认识到时尚文化所蕴藏的政治含义。⑥

美国清史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对环境、物质和可视性的强调。⑦ 越来越多的论著研究历史上人类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建筑环境之间的互动。⑧ 我们对物质和可视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食物和吃饭的方式也已经被当作历史事实来阐述。⑨ 在迅速成长的关于中国出版史的子领域中，很多充满洞见的研究表明，在帝制中国晚期，出版文化的出现没有代替口传文化，

---

① 开创性的工作来自费侠莉的文章《雌雄同体的男性与有缺陷的女性：中国 16—17 世纪的生物学和社会性别界限》，载《帝制晚期中国》（Charlotte Furth，“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Bi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9．2（December 1988））。

② 吴一立：《育龄妇女：晚清中国的医学，隐喻，和分娩》（Yi-li Wu，*Reproducing Women*：*Medicine*，*Metaphor*，*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邓津华：《欧亚：美国，中国和香港的种族混合家庭，1842—1943》（Emma Jinhua Teng，*Eurasian*：*Mixed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Hong Kong*，1842—194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

③ 比如韩嵩：《传染病与中医》（Marta E. Hanson，*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④ 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Dorothy Ko，*Cinderella' 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梅尔清：《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 19 世纪中国》（Tobie Meyer-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米歇尔·金：《生死之间：19 世纪中国溺婴研究》（Michelle King，*Between Birth and Death*：*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⑤ Andrew Morris，“To Make the 400 Million Move：The Late Qing Dynasty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42．4（October 2000）.

⑥ The pioneer here is 安东篱：《中国女性服装的演变》（Antonia Finnane. See her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Fashion*，*History*，*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Like Clunas and Schãfer*（*see below*），安东篱不是美国人（她是澳大利亚人），但是与柯律格和达格玛·沙菲尔类似（见注 109），她的研究完全属于美国汉学研究圈的范围。

⑦ 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Robert B. Marks，*Tigers*，*Rice*，*Silk*，*and Silt*：*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New York 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穆盛博：《渔业战争与近代中国环境史》（Micah S. Muscolino，*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Tobie Mayer-Fong，*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⑧ 柯律格：《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达格玛·沙菲尔：《万物之技：中国 17 世纪的知识与科技》（Dagmar Schäfer，*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Jason Guo 主编：《上海的视觉文化，1850 年代—1930 年代》（*Visual Culture in Shanghai*，1850*s*—1930*s*，Washington：New Academia，2007）。

⑨ Mark Swislocki，《饮食怀旧：地区食品文化与上海的城市经验》（*Culinary Nostalgia*：*Regional Food Cul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in Shangh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而是与之形成互动。① 通过这些研究以及其他研究，世俗的日常生活也成为清史研究的主题。

总之，我们也许会问，美国社会是怎样实现这种转变的？即从一开始对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或主要是漠不关心到产生了一大批关于清史的研究著作，而且，我们得承认，这些著作在历史学领域具有全球化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简单回答之一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经费被用于这样的研究。20 世纪见证了美国经济的腾飞，这一腾飞使得美国人均生活水平达到了世界第一。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第三个 25 年中，社会投入了空前比例的经济剩余到高等教育上，包括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由于我不打算解释的原因，这也许与美国例外论相关，美国社会大量的研究经费被用于对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自 1941 年开始的美国在东亚的三次战争则使得大量的研究经费投入到对中国的研究中，作为对之前研究不足的补偿。

如前所述，美国的清史学界在与中国的历史学者接触时周期性地受到激发，比如蒋廷黻对费正清的影响，傅衣凌和其他社会史学者对后费正清一代的影响。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一个很久的传统，中国历史学者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比如张仲礼）随后回到中国并担任主要的学术职位。但是没有人会料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量年轻的中国学者来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学校学习中国历史。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许是绝大多数？）在美国研究清史并发表了英文的文章和著作，这些学者都是出生在中国并且在中国接受了启蒙教育。进一步说，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现在到中国进行研究，会发现与他们接洽的是与自己在同一个体系中训练出来的学者。在研究者培养和研究主题方面，清史已经极大地全球化了。

---

① 两个不同的例子参见姜士彬：《华北乡村生活的仪式》（David Johnson, *Spectacle and Sacrifice*：*The Ritual Foundations of Village Life in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和郭安瑞：《歌剧与城市》（Andrea Goldman, *Opera and the Ci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关于这一主题的代表性研究（主要不是美国学者撰写但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的兴趣所在）是包捷和易德波主编的《扬州的生活和娱乐》（Lucie Olivová and VibekeBordahl, eds.,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in Yangzhou*, Copenhagen：NIIS Press, 2012）。